

## “为宪政流血”的宋教仁

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宋教仁追悼会,没有到场的孙中山送来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因病缺席的黄兴送来的挽联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虽然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袁世凯及其中央政府是谋杀宋教仁的罪魁祸首,孙中山写下的“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这句话,依然不失为宋教仁之死的盖棺论定!

### 一、同盟会改组国民党

宋教仁,字遯初,又作钝初、遁初,自号桃源渔父,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积极主动地变改朝换代的革命政党为和平竞争的议会政党的现代政治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宪政意识和建设精神的现代政治家。

1905年7月28日下午,宋教仁应约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逸仙)第一次会面,在他所记录的孙中山谈话中有这样的文字:“一切破坏前之建设,破坏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逸仙之言,余尚多,不悉记)。”<sup>①</sup>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宋教仁继陈炯明担任起义机关的编制部部长,“是役布告、文令,皆一出于先生之手。在港时,日与同事诸子,草定《民国宪法草案》焉。则先生于破坏时代,固无时不为建设谋也。”<sup>②</sup>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宋教仁与黄兴随后赶赴武昌,并且在血与火中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据时任鄂军都督府秘书的黄中恺回忆:“(宋教仁)一日入府谓予曰: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宪国家,当宪法未成之先,虽有政府不过临时应急之设施,而临时政府不可无法令以资遵守。此种法令法美先进国家皆曾经过,大抵名之曰‘临时约法’。今革命军初兴,诸事草创,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战事为务,无暇注意及此,一旦临时政府成立,仓促莫就,必感困难。余不敏,日来闲居无事草成约法草案若干条,拟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识者数人枉过寓所共相讨论。予亟服其伟识,欣然而往,至则陈登山、汤化龙、胡瑞霖皆在。宋出其稿授余等传观。”<sup>③</sup>

对于宋教仁的“为宪政流血”,黄中恺解释说:“宋氏于危城之中穷数日之力草定约法,其远见卓识诚足令人钦仰。且当时承专制之余,预想将来政府无论何人不敢十分信任,为思患预防方针预加制限,以防流弊在所不免。时在九月初旬,各项问题皆不可预测。待共和告成,实约法执法者苦其束缚,谓宋氏有心对人,卒致以身殉法遭暗杀惨死,不亦哀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长,直接负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工作,由他草拟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也因此成为“临时约法”的主要蓝本。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参议院在正式国会召集之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临时总统应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选举。国会成立后应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制定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1913年1月5日,临时参议院决定国会采取两院制。8月10日,袁世凯以总统名义颁布“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会议员选举。

按照议员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人与被选人都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工农大众被严格排斥在初步建立的宪政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外。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仅占全部人口的10%左右。尽管如此,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经在中国大地初步确立。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社团参政议政,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达二十多个。1912年春天,为取得即将组成的正式国会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1912年5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实现合并,组成以清末立宪派人士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熊希龄、汤寿潜等人为中坚,以前革命党人章太炎、孙武等人为奥援,以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为最高领袖的共和党。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抗衡,于同年8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改组成立国民党。孙中山、黄兴虽然被推举为理事长与理事,但真正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建设和经营国民党的,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持共和党政见的著名记者黄远生的话说:“平心论之,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耳。”<sup>④</sup>

关于国民党改组的复杂背景,黄远生写道:“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遁初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辰组及某某君等为之奔走密谋,皆与有大力。当未改组前,记者一日面询胡君以改组之事,胡君答称在南京时,以孙中山、汪精卫等不甚主持,故致中止,可见此中阻力之大。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其先同盟会中诸激烈分子不满意于改组者,事定后乃议排斥宋君,不举为理事。于是同盟会之议员某某有力者,乃暗中鼓动统一共和党出头,谓不举宋君为理事,则我等合并之事可作罢。因是宋君乃始得为理事。故宋系云者自参议院中言之也,至于院外宋君能有几许势力,尚难言之,盖宋君所以能于议院中占势力者,以其为改组之原动一也。以其政治思想实与一般政客较为接近二也。大凡首领之性质思想既异,则其部下即不能无派别。”

统一共和党由前同盟会员、国会议员谷钟秀、张耀曾、吴景濂等人组建于1912年初,组建时曾经推举宋教仁为理事。宋教仁虽然公开辞去理事之职,却一直与谷钟秀等人保持密切联络。1912年4月22日,《亚细亚日报》刊登《农林总长与〈亚细亚日报〉记者一席谈》,其中记录了宋教仁的政党观:“宋氏谓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

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欲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

宋教仁所说的同盟会“前此勉强改为政党”,是1912年3月3日的事情。同盟会南京本部于当天召开全体大会,通过新党章,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sup>⑤</sup>

至于“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对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极端妖魔化的谩骂攻击方面。1912年3月28日,由周浩筹资开办的国民党激进派报刊《民权报》创刊发行,该报主笔戴天仇(季陶)一上来就以《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为标题,猛烈抨击袁世凯“病民病国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并且公开告诫同盟会第一大报《民立报》说:“(袁世凯)才足以帝制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sup>⑥</sup>

湖南籍的革命党人邹永成,对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极度不满,以至于在上海跳入黄浦江自尽,因被人及时救起才侥幸不死。他在绝命诗中写道:“轰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sup>⑦</sup>

当时的《民立报》被视为以于右任、宋教仁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的主要舆论阵地,与宋教仁关系密切的该报主笔徐血儿,反过来告诫激烈派说:“奈何群俗(浇)薄,意气相尚,一有不当己意,即假共和假共和之声喧嚣于国中,挑起无意识者之同感而隐以破坏大局于不顾也。……今兹新国家存亡绝续之交,创造艰难,百废待举,民生困苦,疮痍满目,元气未复,补救之道,不可须臾缓。”<sup>⑧</sup>

## 二、孙中山挂名理事长

1912年7月21日,辞去农林总长后继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干事的宋教仁,在已经迁到北京的同盟会本部的夏季大会上表示:“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

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sup>9</sup>

8月11日,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达成一致意见,合并组织国民党。第二天,远在上海的孙文(中山)、黄兴(克强)联名致电同盟会各支部征求意见:

各支部鉴:据北京本部来电云:“连日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协商合并,另行组织,彼此提出条件于下:(一)定名:国民党;(二)宗旨: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三)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四)用理事制,于其中推一人为理事长。昨日开全体职员评议员联合会,合并条件已通过”云云。文等以上列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悖。又得此多数政党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文等深为赞成。且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之义在,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更名称者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特此通电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文等屡承袁大总统遣使持函来邀,已定十七日起程北上,赐复即交北京同盟会本部为盼。孙文、黄兴。

8月1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统一共和党本部、国民公党本部、国民共进会本部、共和实进会本部,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其中的核心理念是这样一段话:“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故标其义曰: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

同一天,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等人致电上海国民公党的岑春煊等人:“名虽合党,实系新造,……同盟会牺牲一切,从我主张,尤为难得。”<sup>10</sup>

共和党方面的《亚细亚日报》,在此之前公开发表评论说:“宋遁初氏专选优秀稳健一派而遗其暴烈分子,且欲牺牲其民生主义,以冀有完全之政党出

现,此吾所深欢迎者也。”<sup>⑪</sup>

事实上,与黄兴联名致电同盟会各支部表示“深为赞成”的孙中山,对于宋教仁等人改组国民党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他在随后写给宋教仁的书信中表白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sup>⑫</sup>

在宋教仁、黄兴死去多年之后,孙中山终于说出了自己当年的难言隐痛:“但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当是时极为悲观,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sup>⑬</sup>

与陈其美等人一起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对宋教仁另有事后清算:“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sup>⑭</sup>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来到北京。第二天,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孙中山中途到会发表演说,重点阐述了同盟会所坚持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今共和成功,民族、民权两主义皆已贯彻,此后宜注重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一意味云,故国民党取民生政策为政纲。但何谓民生政策,人多误会,不知民生政策非均贫富之意,乃预防资本家专制之意。昔我社会幼稚,经济未发达,因无所谓资本家。若共和以后,日进文明,此种现象必见,不可不先以适当之政策预防。试观美国贫富阶级悬绝,资本家之专横垄断,贫民之困苦颠连,不堪言状(引证实例

甚多)(孙君演说至此,有狂人大声疾呼,为警吏挟出),我国宜以为鉴。”<sup>15</sup>

据上海《时报》报道,孙中山的演说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他在演说结束后休息几分钟便离开会场。会议当场推举理事9人:孙中山、黄兴、王人文、王芝祥、宋教仁、张凤翔、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参议30人: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沈秉坤、温宗尧、陈锦涛、陈道一(陶遗)、莫永贞、诸辅成、松毓、杨增新、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徐谦、王喜荃、姚锡光、赵炳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王传炯、曾昭文、蒋翊武、陈明远。备补参议10人:胡汉民、尹昌衡、袁家普、唐绍仪、唐文治、王绍祖、高金钊、许廉、夏仁树、贺日昌。

关于国民党成立大会,当年的文字记录存在着很大分歧。另据1913年5月出版的国民党《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报道,国民党参议名单共29人,其中有胡汉民、柏文蔚、唐文治而没有沈秉坤、虞汝钧、王传炯。除此之外还有名誉参议7人:溥伦、徐绍桢、姚雨平、林述庆、钮永建、马安良、张锡鸾。

在国民党本部的300多名干事中,包括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隼。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选举科主任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耀曾、伍光建、仇鳌。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张东荪。这些人大都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学术,在此后的政学两界发挥过重要影响。

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名理事共同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请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据杨幼炯介绍,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同盟会内部“多有痛哭者,乃拟设同盟会俱乐部于上海,以保存革命之价值,表示不与普通政党相同之义,以安党员。而广东之同盟会,则直到民国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始更名。”<sup>16</sup>

在此之前的8月27日,黄兴在孙中山敦促下由上海搭乘铭新轮北上,于9月11日抵达北京。随行人员有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浚、赵铁、徐少秋、徐申伯、梅同生、杨谱笙、陆惠生、龚禁侵、孙棣山等人。北京方面特派总统府

顾问官张仲华、旅长陈元白前往上海迎接，其隆重程度仅次于孙中山。

孙中山在京25天，先后与袁世凯会谈13次。8月28日晚上，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孙中山和夫人卢慕贞，他在致词中对孙中山倍加赞扬，宣布双方会谈“极其诚恳”，并且在举杯祝酒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在乐声中起立答谢，颂扬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表示自己将“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希望十年后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后在一片掌声中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sup>⑩</sup>

9月25日，经过袁世凯、孙中山、黄兴三巨头的反复讨论，并且征得副总统黎元洪同意，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公布“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装，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八大政策，孙、黄、袁之间还订定了四项政治协议：（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飭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的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飭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作为四项协议的具体落实，孙中山公开宣称自己十年不参加总统竞选，中华民国十年不撤换大总统。袁世凯投桃报李，于1912年9月9日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孙中山三万银元的超级月薪仅次于袁世凯本人四万银元的月薪。9月9日当天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的黄兴，随后也被任命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接替他的湖南同乡谭人凤。按照唐德刚的说法，

孙中山在袁世凯的怂恿之下，“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还未突破7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故有此失”。<sup>⑧</sup>

被时人誉为“南北调和”积极成果的“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与国民党的既定政纲相比较，一是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二是忽略了国民党五条政纲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发展地方自治。”这是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重大迷误。

### 三、国民党的内部危机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然而，由此而来的盲目乐观，偏偏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1912年10月3日，当时最具影响力也最具职业精神的上海《申报》，在《国民党竞争之暗潮》中报道说：

国民党中之旧同盟会，其人物之分系，原分为孙文、黄兴、宋教仁三派。孙派以广东为中心，南洋商人、西洋高襟学生属之。黄派以南方为中坚，革命健徒属之。宋派人物之臭味亦同孙、黄，而同盟派之参议员及政党各员属之。南北统一以后，孙氏知实力不能敌袁，不欲置身政界，遂籍办理铁路事业飘然而去，其徒党亦多离中央。宋氏则早入中央，为农林总长，辞职后与袁接近，既欲组织其理想的宋氏政党内阁。惟黄氏在南方颇持强硬态度，作袁劲敌。近来入京后大反从前所为，极意与袁联络，袁亦极力与黄互相提携。迨陆子兴告病，袁因与黄商及总理问题，黄举国民党之沈、宋二人以对。袁谓：遁初才华极为发越，惟临时政府期间内可姑养望，沈某阅历极深，可以担任。黄以己为国民

党魁参议员，又占多数，保其必可通过。不料宋教仁闻信暗中运动参议员及国民党主干员，极力反对沈氏，竟不能通过党议，于是黄派之人闻之大愤。宋之所为，遂有另行组织政党之意，且宋氏所主张之一政党内阁，亦为自家的政党内阁。现在国民党之党员欲争总长者二十余人，欲为次长者五十余人，势不能各得所欲，故宋氏之政党内阁终难达其目的云。

“陆子兴”就是继唐绍仪之后出任临时内阁总理的外交部长陆徵祥。被黄兴推举出来候选内阁总理的“沈”，就是与黄兴、宋教仁同为湖南人的沈秉坤。他在清朝末年任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期间被推举为广西都督，由于遭到副都督陆荣廷的强力排挤，只好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被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取代之后，沈秉坤曾在南京担任过黄兴的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

国民党方面的《民立报》，于10月7日刊登《追记政局之变迁——宋渔父谈话》，其中介绍说：袁世凯于9月20日前后委托宋教仁的湖南同乡范源濂、刘揆一劝说宋教仁（渔父）出任国务总理。孙中山来到北京后也向袁世凯推荐宋教仁出任总理，黄兴又打来电报劝他上任，都被他坚决拒绝。其理由是：“（一）因临时政府期内，为时太促，不能多所展布；（二）因调和南北感情，须有威望素著之人，始能得人信仰。故力荐黄克强担任内阁，当时所以有黄内阁之说。”黄兴（克强）、陈其美（英士）一行北上时，宋教仁专程到天津迎接，期间曾与前国务总理唐绍仪讨论总理人选：“余至天津晤唐君，唐力劝余组织内阁。余力荐黄克强，又与黄克强、陈英士同往访唐，会议良久，余以现在大势如裁兵、借款、外交各种重要问题，非威望素著如黄君者出任总理，恐不能无他项掣肘，反于进行有碍，仍请唐君力荐黄为总理。唐、陈两君均极赞成。”

记者接下来问道：“外间言袁总统因黄不担任总理，同时提出沈秉坤、赵秉钧二人，黄均赞成。君则赞成赵，不赞成沈，其理由安在？”宋教仁回答说：“当时国民党多数不赞成沈。我不同意沈者并不是反对个人，而是担心沈任总理，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党议必然要被破坏，而且对于沈的提名在参议院也不

一定能够通过。”

话虽这样说，继陆徵祥之后出任内阁总理的依然是国民党人，他就是刚刚被黄兴争取入党的袁世凯亲信、内务部长赵秉钧。黄兴根据党内意见，向袁世凯提议由赵秉钧出任临时内阁总理，由沈秉坤任内务总长。袁世凯不同意把兼有民政权与警察权的内务部交到沈秉坤手中，而是改派他充当有官无职的浦口商场督办，内务部仍由赵秉钧兼任。宋教仁关于此事的解释是：“赵虽入国民党，与袁总统实有密切关系，可云袁派内阁；且政府经验甚富，力量亦较厚于各方面，易收效，当得孙、黄两先生及国民党多数之同意，此所以赞成之也。”

黄兴在北京期间，曾当面争取袁世凯、杨度加入国民党。袁世凯避而不谈。袁世凯的亲信、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居中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和宋教仁认识的杨度，随后从北京给黄兴发来电报：“前承不遗，邀入国民党，只才识无似，未敢遽诺。近日京中贵党干部诸君继续招邀，议及党略，度以为贵党以前之经过，及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四字所缚。虽云根据学理，然贵党从前对于项城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亦事实之昭然。度意此后贵党对于民国，对于总统，宜求根本解决之方，若不信袁，则莫如去袁，而改举总统。度必劝隐，袁必乐从。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以求实际沟通，度方可有效力之处。若仍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有损，非上策也。度姑以党外之人预为建议，自分子贵党党员，关系甚浅，不敢轻于投身，乞公据度此电，通电全国贵党本部支部，征集意见，若多数赞成鄙意，见诸实行，方敢追随左右，不仅以此规贵党之方针，且以此卜一身之信用。进退所关，伏维裁察是幸。”<sup>19</sup>

杨度所说的“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堪称是对于用右手让出政权同时又想用左手收回政权的国民党方面的经典批评。1912年9月16日，宋教仁专门在《民立报》发表致北京各报馆的公开书信，想要化解的正是他所面临的“相挟相持，互生疑虑”的现实困境：

连日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当，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事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党员无论新旧，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爱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内江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歧异，更何至有冲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勉不能成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日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作此等谣言之各报，属于何党固不必辨，鄙人总深盼其守政党道德，不再事无谓之猜忌与离间，平心静气以评论国家事，扶持各党，使渐臻于健全之发达，庶几各党乃得日即稳固，从容研究。其在议院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其对政府有适当之监督方法，以促成强固有政策负责任之内阁。是岂非国家之大幸事乎，区区之心乞鉴谅之！宋教仁顿首。

随着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1912年10月15日，国民党参议员会在北京成立。10月19日，宋教仁、王宠惠等人乘火车沿京汉路南下从事选举活动。12月29日，宋教仁给留守北京的私人秘书刘白（羹臣）写信，大致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在桃源老家为老母亲祝寿“空消十余日，屡接京中电促，亦未能出山也”。写信时已经离开家乡抵达常德，“为调和西路选举事，小住数日，拟即赴长沙，再赴汉口，与克强商议一切，然后定行止，或赴日本，或来北京，尚未定”。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对于党内斗争的分析判断：“政党形势，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但目下究竟详情如何，尚乞电示。”<sup>②①</sup>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政党政治的制度建设方面，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占有当仁不让的绝对优势；其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制度建设的宋教仁，无形中造成了在国民党内拥有很大势力的陈其美一派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局面，从而造成“本党有内讧”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这两方面的估计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与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了他自己“为宪政流血”的悲惨结局。

#### 四、宋教仁的阳光宪政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南支部发表竞选演说时表示：“现在民国未经各国承认，于国际上非可谓之成立，然其原因，则内部未能整理之故也。……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此兄弟之所希望于本党诸君者也。”<sup>②②</sup>

2月1日是旧历腊月二十六日，宋教仁顾不上与家人共度春节，毅然离开家乡来到武汉。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发表的演说，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党理论：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

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队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刻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怕。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sup>②</sup>

2月10日,宋教仁又在国民党湖北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对中央政府在财政、外交等方面的措置失当提出批评,其中特别提到临时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外交方面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sup>③</sup>

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已经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考察,随同的有在国民党内以激烈著称的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人。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其中特别谈到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sup>④</sup>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揭晓,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共596人,其中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得26

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得38席、无党派得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

3月8日,宋教仁在南京发表演说,再一次阐述自己对于政治体制与权力架构的基本构想:“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庸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大纲既定,地方问题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观察使等官制,实为最腐败官制,万不能听其存在。”<sup>25</sup>

宋教仁的上述言论,特别是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长篇演讲,招来北京方面的匿名批评,上海《时报》北京电指出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是“某当局”。“某当局”在文章中除了对国民党方面横加指责外,还针对宋教仁展开人身攻击:“谓与总统有意见乎?吾见其运动内阁,当时媚事总统,惟恐勿至,水乳相容,已无间隙。谓与现在执政有宿怨乎?吾见其运动内阁,当时款宴访问,几无虚夕。钝初交际能名,轰传流辈,声气相投,已无隔膜。然则其叹息痛恨,力诋狂詈,正自有故。……一以发泄旧愤,一以排挤旧人,夫然后目的可偿,总理可望。其手段奇,其用心苦矣!”<sup>26</sup>

宋教仁在没有读到全文的情况下,先在1913年3月12日《民立报》发表一篇《宋教仁君之时事谈——驳某当局者》,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某当局又谓余因争总理未遂,故发此怨愤无稽之言,亦可发噱。余始对于第一次内阁更换时,主张蔡君元培,二次主张黄君克强及赵君智庵,实未有自为之心。非不为也,实因余之资望能力皆不及诸人也。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推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

甚乎？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其既为之，则只宜责备其为好总统而已。人之欲为总理、国务员者，亦当待以如是，方为合于民国时代之常轨。”

3月15日，宋教仁又在《民立报》发表长文《答匿名氏驳词》，其中坦然承认：“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

接下来，宋教仁话锋一转反驳说：“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若乃目为野心，咸起非笑，则直是视民国职务与君主国之官爵相等。”

关于自己与政府当局之间的良性互动，宋教仁表白说：“吾人非难政府，非与政府有恶感，只问其行事之若何。若以有恶感，而即故意非难之，则必以有好感，而故意逢迎之，此乃公等官僚卑劣之故态，吾人岂为之耶？吾人素来作事，不存权利之见，亦不畏强硬反对，吾惟行吾之素。”

在这篇文章的附言里，宋教仁还谈到有多家报纸刊载北京救国团致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报馆、各团体的电文，“亦驳予演说，其文辞大抵与某氏文同，盖与某氏同系统者，而东扯西拉，文理不通则过之”，进而光明正大地表态说：“凡与人驳辩，须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匿名揭帖，或假造团体名义，皆有似盗贼之行为。今后再有此，吾人岂屑与较量耶？”

1913年3月1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发表最后一次演说，其中所阐述的正是他一直从事的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现代化的制度意识：“吾

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均同一为政治的生活。……就吾党与民国政治上之关系而言，不过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吾党现今应有之党略，亦当依此方针，以谋稳健之进行。”<sup>27</sup>

## 五、“临时约法”的法理缺失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是在南北议和的大背景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按照南京方面与袁世凯方面事先达成的协议，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应该向临时参议院咨请辞职，并且推荐袁世凯继任。1月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明确表示：“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sup>28</sup>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且附加了三项条件：“①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②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③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如约选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教仁是湖南省参议员，他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极力主张采取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坚决反对这种架空自己最高权力的制度设计，一些革命党人甚至指责年轻气盛的宋教仁想做内阁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仅否决了责任内阁制，而且连内阁总理也没有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负责。孙中山依据黄兴的推荐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不予通过，改由程德全递补当选。然